

1

“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毛泽东和文正莹

寄居“棠佳阁”

巍巍韶峰，位于湖南湘潭、湘乡、宁乡三县的交汇处。相传，舜帝南巡，见这里山川秀美，遂奏九天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韶峰由此而得名。钟灵毓秀的韶峰，孕育了一代天骄、千古伟人。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诞生在韶峰东麓韶山冲上屋场的一户普通农家里。

韶峰偏北，有一脉与之一比高低的龙头山，主峰海拔440米，为韶山境内第三高峰。大自然神奇的造化，使这里的山水既险峻峭拔又秀丽幽深。山谷盆地中，有1966年夏天毛泽东回韶山时住过的别墅——滴水洞。沿别墅陡峭的山路蜿蜒而下，西面山苍岩岌，巍巍雄奇；东面绿水粼粼，空明澄碧。《毛氏族谱》是这样描写这里的自然风光的：“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别墅后山有一条茅封草长的小道，直上龙头山。当年毛泽东在滴水洞山谷散步时，曾指着龙头山对工作人员回忆说：翻过这道山，就是黄田坳。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属湘乡，山这边是韶山，属湘潭县。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毛泽东还指着山沟那条羊肠小道说：“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就是沿着这条山沟过湘潭坳的哩……”



毛泽东的旧居——韶山南岸

是的,毛泽东永远也忘不了这条山道,忘不了山道那边的小山庄。幼儿时期的他,曾挎在父亲的肩臂上,沿着滴水洞的山路,前往外婆家——湘乡县大坪乡唐家坵。

有关文史资料记载:毛泽东从两岁多开始直至1902年春进南岸私塾读书,一直是寄养在外婆家,他幼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坵这个小山村度过的。

唐家坵,又名棠佳阁,与韶山一山之隔,约十多华里。毛泽东的曾外祖父文作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由于家庭生活极度贫困,劳动艰辛,刚过27岁就染病去世了。曾外祖母贺氏,含辛茹苦,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受尽了人世间的各种苦难与折磨,终于把孩子带大成人。贺氏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人极能干,又肯吃苦,她长年累月给富人做饭、洗衣服,还让三个儿子到湘乡城去卖工挣钱。靠她的里外操持,慢慢地家里竟有些节余,后来居然置些田地,并买下了唐家坵房屋一栋。直到19世纪初,文家已经发展为有20多口人,拥140亩田地的大家庭了。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行二，字绵薰，是一个毕生耕种，勤劳朴实，品端行洁的农民。外祖母贺氏，一生孝慈淑慎，生育三子三女。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父亲毛贻昌的遗像

毛泽东的母亲在同辈姊妹中排行第七，家里人都叫她“七妹”。她13岁到毛家做“黄花媳妇”，正式结婚时是18岁。在毛泽东之前，文七妹先后生育了两个男孩，但都不幸夭折了。毛泽东出世后，她自然看得极为娇贵。毛泽东还只有两个多月时，她就偕丈夫毛贻昌将儿子抱到唐家坵外祖家“过路”。外公、外婆和舅父、舅母看见眉目清秀、方面大耳的毛泽东，一个个都甚是喜爱。特别是外祖母，把小外孙看得更是金贵，硬要女儿文七妹把孩子放在她身边抚养，说是韶山南岸屋场不发人，女婿毛贻昌的八字命又太硬，把小外孙寄养在人丁兴旺的唐家坵可以消灾避难，长大成人。一向敬神信佛的文七妹虽然听信母亲的话，但正因为相继痛失二子，再怎么也舍不得让毛泽东离开她。为了不却老人的好意，答应十天半月常带儿子到外婆家小住。外婆见留不住小外孙，也只好作罢，但定要给他取个乳名。湘乡这块地方有种风俗，要把命根子带大成人，往往用家禽家畜取小



名,因为这些东西“贱”,越“贱”就越容易养。于是有的叫狗伢子,有的叫猪妹子。外婆不喜欢这类小名,她看中了龙头山南麓那块平地拔起的大石头。这是一尊高达20米的青色岩石,岩石大小两块紧密相连,作搂抱状,恰如婴儿亲昵地偎依在母亲的怀抱里。岩石底下有一股清泉,无论天怎么干旱,总是终年流水不竭。传说这地方出过山妖,经常兴妖作怪。观音大圣为民除害,施展法术降了妖怪,这块巨石便是她的化身,山妖被她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人们把这块石头称做“观音岩”,将它当成大神朝拜。外婆和文七妹把毛泽东带到观音岩前,备了菜馐酒饭、香烛纸钱,烧香叩头,让外孙拜石头为干娘,又因他排行第三,便取乳名叫石三,唤做“石三伢子”。

后来,似乎应验了外婆的话,毛泽东虽然取了一个很硬的乳名,又拜观音岩为干娘,可仍长得不顺当,总是病病怏怏的。文七妹记起母亲的话来,想到这翻山南岸单家独户、冷冷清清的,孩子连个玩耍的伙伴都没有,整天形单影只的,长久下去怕影响孩子的成长。于是,她通过和丈夫毛贻昌商量,便在1896年春,也就是在她即将生产第二个孩子泽民之前,把毛泽东送到了娘家——唐家坵。

寄居唐家坵,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驿站。在这里,他成为舅父文正莹私塾里的一名“旁听生”,接受了长达数年的学前教育。

“小小陪读郎”

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颇有文才,在家里办了一个蒙馆。这是一种旧式的学堂,是专门给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一般只有一位老师,招收一二十名七八岁乃至十岁左右的孩子入学。

那时,蒙馆里教的,不用说四书、五经,就是最初的启蒙书,如《三字经》等也都是古文,言简意深,七八岁的儿童是懂不了的,所以,老师上课只教学生识字、读书、背书,布置的作业是“描红”写字。

当时,毛泽东只有几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



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到屋后的田里去捉蚱蜢。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文正莹的三子、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文南松,把毛泽东带到文正莹的学堂里去玩耍。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个稚童竟能安然地坐下来听八舅讲课,跟着学生们一起念书。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这样有天赋,文正莹心里特别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毛泽东儿时接受学前教育的地方——湘乡县唐家坵外婆家

文正莹自幼饱读诗书,精通史籍,深知历代的“神童”都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教育的,更懂得早期的智力培养对整个人生的重大影响。因此,他有意对聪慧的外甥进行精心培养。就这样,毛泽东这个小小陪读郎,在唐家坵私塾度过了正式延师入学前的那段时光,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学前教育。

这期间,文正莹除了在课堂教毛泽东读书识字外,还抽空给外甥教读一些适合幼儿趣味的古诗,像曹植的《七步诗》,骆宾王的《咏鹅》,李白的《静夜思》和李绅的《悯农》等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都是他最初教会毛泽



东背诵的。后来，文正莹见毛泽东接受能力特别强，就把他在学堂里给学生们讲授的文章也教给小外甥。

数十年后，当年每天带毛泽东上学的文南松，对从师家父门下的这段启迪童蒙生活仍记忆犹新。老先生曾对后辈回忆说，那时父亲对毛泽东的期望值很高，望子成龙之心也太切，有时甚至忘了表弟还是个小女孩，常常教一些超出幼儿年龄范围的东西。如教毛泽东和他读难度很高的童蒙诗书《千字文》和《六言杂字》，还讲授过被鲁迅先生曾经称之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据文南松讲，他的父亲很欣赏这部诗作，诗的作者汪洙为宋代神童，九岁善诗，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在这首诗中，汪洙全部用的是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而诗味浓郁，音韵和谐而对仗工整，宣扬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正统思想，故而被父亲列为私塾学童习作诗词的教材之一，不仅在课堂里要求学生认真加以学习，还在闲暇时间把它教给“陪读郎”毛泽东。文南松记得，当时他和表弟毛泽东都还小，不懂诗中的含义，只朦朦胧胧地记得父亲文正莹说过，这是宣讲读书好处的书，就跟着他囫圇吞枣地背诵，由于该诗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竟学会了不少。这首诗中的不少句子，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到老都铭记于心，很难忘掉。

的确，正如文南松所回忆的那样，文正莹是一位正统思想观念颇为浓厚的旧文化人，他打破常规培养教育外甥的最初愿望，自然是要把毛泽东引向“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之路。但是，有一点却是应当肯定的，那便是通过这种教育途径，使毛泽东获得了对于一般的农家稚童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知识启蒙，最大限度地开掘了智力。

童年的馈赠

文正莹虽然是一个没有求得任何功名的“布衣”，但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常自叹命运不济，此生壮志未酬，故而把满腔的热望寄托在下一代



的身上,常教导子侄外甥们从小要树雄心,立大志,学得真才实学,将来建功立业。

文正莹对天资聪颖的小外甥所抱的希望尤大,在教毛泽东读书学字的同时,还经常给他讲述古今中外英雄的故事,像“韩信智胜楚霸王”、“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岳飞大破金兀术”、“林则徐虎门烧鸦片”等名篇,不知讲了多少遍。因此,韩信、梁红玉、岳飞、林则徐等英雄豪杰的高大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田里。

文正莹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投降卖国的行径十分不满,常在课堂向学生讲述国家遭受外侮的事,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报国之志。文正莹还教导小外甥毛泽东要好好读书,将来如能考得功名,一定要做个好官,像历代民族英雄那样扬我国威,振兴家邦。

文正莹是一位为人正直、注重节操的乡中儒士,他虽知识不薄、资财不菲,但平素最看不惯那些仗势欺压穷苦百姓的人。有一年,当地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东要送自己的儿子到文正莹手下读书,被他以面试不合格为由加以拒绝。当时,年幼的毛泽东对八舅的这一举动大感不解:为什么唐家坵好多佃户的伢子都可免费到八舅的学馆里读书,而却把这个家大业大的富家子弟拒之门外呢?文正莹事后告诉外甥,这个人先前也通些文墨,后来利用知识挣了不少钱,回过头来又去专门欺侮四乡八村里那些没文化、没钱财的种田人,赚他们的昧心钱。他由此告诫毛泽东:文化知识是帮助人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的,如若不然,有文化的人变坏则比没文化的坏人更坏。

为了教育毛泽东等子侄们学着“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学生。《家范箴言》主要内容为文氏家戒和家训,“家戒”有六条,即“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家训”共有十则,内容颇为细密,其形式和作用与今天的乡规民约有些相似,故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培植心田。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愁,到处有人称美。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堕海沉渊。吃斋念佛



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

二、品行端正。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侮法有何长，但见天良尽丧。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

三、孝养父母。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鸟雏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

四、友爱兄弟。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竟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五、和睦乡邻。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

六、教训子孙。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痒，不许闲游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为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舐犊养成无状。

七、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膳。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八、婚姻随宜。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繁华，曾见繁华品谢。韩侯方歌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

九、奋志芸窗。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练志无休，诵读不分夜昼。任他三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

十、勤劳本业。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技巧。

据文正莹之子文运昌回忆，父亲结合课堂教学，始是教弟弟文南松和



毛泽东等学童诵读《家范箴言》，继而要求他们熟记，并引以为为人处世的行动准则。文老先生认为：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家范箴言》规范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文氏后嗣们的思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特别是悟性极高的毛泽东，自打幼年时期熟读了八舅文正莹编撰的《家范箴言》起，一个人应当“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做一个像八舅一样的好人”等朦胧的思想意识，便已经开始在他的大脑中萌生。

自然，最令毛泽东难忘的，还是在八舅身边度过的那段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时光。从两岁多寄养唐家坵起，“根基不稳”的毛泽东，便得到了外婆外公和舅父舅母的格外看待。特别是文正莹，更是对妹妹文七妹的这个“命根子”视若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在每天的学习之余，他都要让儿女们带着毛泽东到秀美的山冲里去尽情玩耍；闲暇的时候，他还常常带着毛泽东登上唐家坵对面的龙头山，春采蘑菇，夏摘甜苞，秋打毛栗，然后舅甥二人坐在山顶的大青石上，一边品味着野果，一边远眺着山南麓的韶山冲；有时，在皓月当空的夜晚，舅甥二人在家门前的打谷场上铺一领竹凉席，惬意地躺在上面，一边数天上的星星，一边听文正莹讲述奇妙的天文地理和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动人故事……农家田园生活的浪漫气息和四世同堂大家庭的无穷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以致每每父母从韶山来到唐家坵探望外公外婆，他总是避而不见，生怕把自己带回去。

但是，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临了。那是1901年深秋时节的一天，毛泽东、文南松和小伙伴们相邀一起来到唐家坵村前的田畈，田间的稻子已经收割了，小伙伴们有的追逐着稻禾桩里的青蛙、蚂蚱，有的抓起田泥做泥人、泥兽。玩累了，大伙就围坐在田头的青石板上，边休息边闲聊。这时，不知是哪个小伙伴指了指不远处的田畈，说：“润之，你看，你爸爸来了，要接你回去！”毛泽东本不愿离开外婆家，以为小伙伴又在耍他，不禁有些生气。蓦地，他纵身跃到田里，扬腿朝那些小伙伴做好的泥人、泥兽踢去。小伙伴们见毛泽东端坏了他们精心做好的泥人、泥兽，一个个恼了，他们中有的人顺手抓起田泥朝毛泽东砸去。于是，一场由“嘴仗”引发的“泥仗”爆发了。毛泽东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场发生在小伙伴们之间的“泥仗”惹怒了自己的父亲，并一气之下把他领回了韶山，从而结束了在唐家坵私塾



充当“小小陪读郎”的生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文七妹见自己的爱子已有好久没回家了，不由心生惦念之情。就在毛泽东和小伙伴们在田间打架的这一天，她让丈夫毛貽昌带了一些自产的时鲜瓜果，到唐家坵去看望儿子。毛貽昌刚翻过龙头山，来到唐家村坵前的八斗坳田畈，就见一群伢子高声叫喊着，相互抛撒着泥团，儿子毛泽东也在其中。事情偏偏也碰巧，当毛貽昌打从田埂上路过时，毛泽东正捏着一团泥追打一个伙伴，却未料不偏不倚正丢在父亲的额头上。脾气一向暴躁的毛貽昌恼火不已，盛怒之下，揪着儿子的耳朵来到唐家坵，当着岳母的面将儿子痛打一顿。打完了，还罚毛泽东对着私塾的神龛下跪。毛貽昌还对文正莹数落道，石三只顾撒野，也不跟八舅学些识文断字的正经事。

文正莹一听这话，一边起身扶起外甥，一边对毛貽昌说道：“这你可就错怪孩子了，石三虽然年幼，尚未入馆就读，但每日到我的学堂里玩耍，也学得了不少的诗文。不过，老是这样也非长久之事，他已到延师的年龄，你这次就把石三带回去吧！”

眼看就要离开生活了五六年的外婆家，就要离开对自己视若亲生的八舅文正莹，毛泽东不由难过得哭了起来。

小伙伴们见毛泽东因打泥仗而挨打，又听说父亲真要带他回韶山冲，都感到很对不住这位唐家坵的小客人、私塾里的“小小陪读郎”。大家来到文正莹老师的家里，围住毛泽东抱头痛哭，都怪那些用黄泥巴捏成的人和兽，不是它们便不会有这档子事。

文正莹也舍不得这个聪明可爱的外甥走。几年来，他经常与毛泽东食同桌、寝同床，手把手地教毛泽东读书写字，可谓倾注了比自家孩子还要多的父辈之爱、蒙师之情。眼下外甥这一走，便再也不能天天见面了。但他明白，要使外甥成大器，自应让他早些上学堂读书。于是，文正莹一边替毛泽东揩干眼泪，一边含着眼泪劝外甥跟父亲一道回去。

下午，毛泽东就要上路了。临行前，父亲带着他向外公外婆、七舅八舅和舅妈及表兄弟们辞行。八舅文正莹牵着毛泽东的手嘱咐道：回去后用心读书，要多识字。他还把自己那本心爱的《康熙字典》送给了外甥，告诉



外甥只有多认字，才能读好多的书，懂好多的道理。

就这样，毛泽东告别了唐家坵，离开了八舅文正莹，回到了韶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幼学童蒙生活。

“八舅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好大咧！”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不久，即正式拜师读书了。

从此，毛泽东虽然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样直接得到八舅的教导，但每逢四时八节放假时，他总忘不了要翻山越岭到唐家坵去看望八舅，并接受八舅关于做人和治学的谆谆教诲。毛泽东喜欢读书，可是爱看的是“闲书”、“杂书”，父亲对此本来就反对，何况他平时一个钱恨不得掰成两个花，哪肯花钱买这些书呢？

毛泽东有时向妈妈要点钱，但妈妈手上的钱也很有限，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无钱买书读，但借书却不用花钱，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四处借阅各种书籍。

开始，他向韶山冲有书的人家借，但是，隔不了多久，韶山冲所有的书他都借来看了，甚至连古庙里和尚的经书，也都借来看了。怎样才能借到更多的书呢？他自然想起了唐家坵的八舅文正莹。

他记得八舅文正莹的屋里放着很多书，于是便到八舅家去借书。到唐家坵来回虽只有二十多里，但山路崎岖，费时又费劲。每次去借书，总是天麻麻亮动身，摸黑才回家。

就这样，在数年的私塾生活中，毛泽东在八舅文正莹这里借阅了很多新书和报纸，甚至一些新开办的洋学堂里用的国文教科书都借到了。这使他大开眼界，心目中已不再仅仅是小小的韶山冲了。

1906年，毛泽东休学在家。这时，他的父亲毛贻昌想送他去湘潭城里的一家米店学徒。那家米店的老板毛槐林是毛贻昌的房兄，关系一直很好。毛贻昌希望儿子在经商上搞出名堂来，日后成为一个财东。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去，在去外婆家看望舅父舅母时，将这一情况及自己不想去的心思告诉了舅父。

听了外甥的叙述，文正莹对妹夫毛贻昌只顾搞发家致富，而不管孩子前途的做法，颇为不满。他是看着毛泽东长大的，深知这个外甥很有读书



天分,若是半途而废,那太可惜了。因此,他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劝说妹夫改变要毛泽东弃学经商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文正莹就和哥哥文正兴、儿子文运昌一起,偕同外甥毛泽东来到了韶山冲上屋场。在中午的招待席上,文正莹在闲聊了一番外甥儿时唐家坵读书的逸闻趣事后,当着妹夫毛贻昌和众人的面夸赞毛泽东“绝顶聪明”,“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希望妹夫要好生培养,切莫耽误和埋没了外甥。他还建议,干脆送毛泽东到城里的新式学堂去读书。为了说服毛贻昌,他还将儿子文运昌曾经就读过的湘乡东山小学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说那里是怎样注重新书,开设了很多西方“新学”课程,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是很不错的,等等。他的介绍,打动了毛贻昌,也坚定了毛泽东去那里读书的决心。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兄长文正兴、毛泽东在韶山的塾师毛麓钟、李漱清、毛宇居等人的支持,大家都纷纷劝说毛贻昌送子去新式学堂读书。在众人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放弃送儿子去学经商的打算,同意毛泽东继续上学。

就这样,入秋以后,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通过考试后,成为了这所“洋学堂”里的一名正式学生。湘乡县城离唐家坵路途遥远,文正莹不能亲自照看外甥,便一再嘱咐同在湘乡县城读书的儿子文运昌,妥为关照表弟毛泽东。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除了学好学校的各门功课外,还喜欢阅读中外的历史、地理及其他各种新书。当时,流传东山学堂的新书报虽然不少,但仍不能够满足毛泽东的读书需求。文正莹得知这些情况后,常让同在湘乡城念书的儿子文运昌捎带一些新书给外甥阅读。在文家所借的新书中,令毛泽东爱不释手而留下了深刻影响的有两本:一本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本书批评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政治变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主张变革以御外侮,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这些观点,使毛泽东很受启发,因而非常喜欢。另一本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是一份半月刊。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都感到新鲜,因此读了又读。毛泽东还在该报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



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书，便去了长沙。虽然学校换了几所，但在文运昌处所借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两书却携带在身，不时翻阅。1915年寒假期间，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父家向舅父文正莹等拜年，顺便带来了《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由于文运昌不在，又因为两书借阅太久，有所损毁，便留下了一张“还书条”，以示歉意。在这张还书便条中，毛泽东写道：“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②解放后，这个便条被收藏人文运昌上缴给国家，成为文正莹父子二人支持早年毛泽东追求真知的有力佐证。

对在求学阶段八舅文正莹父子给予的帮助，毛泽东到老不忘。解放后，他在同表兄文运昌、文南松等见面时，曾一再提起当年舅父们力劝父亲送他到“洋学堂”读书和他在八舅家借书常常因久读未还而损坏的往事。他说：“八舅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好大啰！不是他老人家，我可能还是一个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庄稼把式，怎么也到不了现在这个样子哟！”

“世界上最好的人”

自从在八舅文正莹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后，毛泽东便步入了一个新的广阔世界。由韶山而湘乡，由湘乡而长沙，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天地。

1918年夏季，毛泽东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了八舅对他的关怀，从第一师范顺利毕业了。

暑假期间，他怀揣毕业证，满怀着欣喜之情，回到了故乡韶山冲。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踏进上屋场的家门时，却发现家里是冷冷清清的。原来，母亲文七妹身患“蛾子”，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淋巴腺炎，脖子发肿，水米难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第8～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② 《毛泽东传》（1893—1949）第8～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这是当年毛泽东在八舅文正莹家借阅的进步书籍《盛世危言》及写给表兄文运昌的还书便条

进；父亲一心想发家，正利用夏收这一大好时节，到四乡收购稻子，拿到银田寺贩卖，因而无暇顾及母亲，便把她送到了唐家坵外祖家里，请八舅文正莹和七舅文正兴代为照看。

闻此消息，毛泽东一刻也没有停留，立刻赶到了唐家坵。此时，外公外婆早已过世，七舅八舅已分家析产，母亲文七妹由两位舅父轮番照料饮食起居和负责请医治病。毛泽东先见过七舅后，即来到隔壁的宅院里拜见八舅和住在这里的母亲。文七妹在病榻上闻知儿子从长沙归来，十分高兴，挣扎着要下来，被毛泽东劝阻住了。他坐在床沿，详细地询问母亲的病情，并报告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当他得知母亲在舅父的精心护理下身体稍微有所好转后，不由对娘舅心生感激之情。

在唐家坵住了数日，毛泽东告知母亲和舅父，他已经同一些同学约定好了，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即将前往北京。言谈中，自然流露出对母亲病情的担忧而不忍离去的愁苦心情。为支持外甥安心地去干自己的事



业,文正莹安慰毛泽东,尽管放心地去长沙、去北京,照顾母亲的事有舅舅和表兄弟们,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于是,毛泽东告别八舅和母亲,从唐家坳取道湘乡,而后乘船到了省城长沙。

8月初,毛泽东和一批湖南进步青年,齐聚在他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将启程北上了。

恰在这时,文正莹让已从师范学校毕业、正在湘乡县担任教师的儿子文运昌,托一位老乡给毛泽东捎来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自毛泽东赴省之后其母文七妹的病情,转达了重病中的文七妹对爱子此次远行的忧虑与牵挂之情。

捧读舅父托人辗转捎来的家书,毛泽东的思绪起伏难平,一股思亲之情不由涌上心头——就要离开长沙了,虽然只是短暂的离开,但这对于一个从未离开湖南的乡下青年,毕竟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此次要去的是千年古都北京——一个对他来说十分模糊而又颇为神往的大都市。可是,毛泽东又是讲究孝道的人,他爱他的母亲,因为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人,是一位为丈夫和儿女奉献了一切却毫无索取的人。在韶山冲南岸这个家庭中,只有她一年四季最忙碌、最辛劳——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养鸡喂猪,锄园种菜,样样事情她都干。而今,她积劳成疾,久治不愈,在这样一个时候,作为儿子,无以尽孝,却又要远她而去,全靠娘舅代为照料。想到这些,毛泽东的心头平添了对慈母的无限惦念,对舅父的万分感激。

是夜,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住所,就着忽明忽暗的灯光,给八舅文正莹及八舅母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书信。信中写道: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泽民)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①

^①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



毛泽东将信寄走不久,于8月15日与20多名湖南热血青年一道,在长沙启程北上。

在京期间,毛泽东一直把母亲的病痛挂记在心中,但由于他身系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重任,又不得不留在北京,并在这里度过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这期间,毛母文七妹继续留居在哥哥文正莹家中,由哥嫂照顾病体。其时,她的病情日见危重,已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为了能使她得到精心的照料和护理,文正莹不顾乡间风行的出嫁姑娘不在娘家过年的习俗,挽留她在唐家坵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早春。3月12日,毛泽东在送走了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友之后,便行色匆匆地从上海赶回长沙。

毛泽东抵达长沙的日子,是1919年4月6日,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以毛泽东的性格而论,他本是不会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离开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的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而匆忙地回到生身之地湖南的。但是,他为什么又恰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回来了呢?原来,就在春节前夕,文七妹深感自己的病情日益加重,而远在北京的爱子毛泽东,却未能返回家乡过节,不由心生挂念,便让哥哥文正莹给儿子代写了一封家信,在信中再次告知了自己的病情,诉说了半年来骨肉别离的痛苦,希望毛泽东能够早些返乡团聚。在这封家书的末了,文正莹还以他的名义告诉外甥,鉴于文七妹的病情已趋恶化,他已和毛泽东的父亲商定,待过完春节后,即按毛泽东上次来信之所托,派专人护送她到省城治疗,并嘱咐毛泽东届时返回长沙照看家母。接到八舅的来信,勾起了客居异乡的毛泽东对母亲的牵肠挂肚之念,因而一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正式落实之后,便即刻回归故里。

毛泽东回到长沙时,父亲毛贻昌因家事和农时缠身,已委托舅父文正莹安排弟弟泽民陪同母亲先期来到了省城。这期间,毛泽东日夜陪伴母亲,送汤送药,恪尽人子之责。他觉得母亲难得来省城一次,又正值泽民、泽覃均在长沙,便同母亲一起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照。在这张照片中,母亲坐中间,毛泽东站在左边,毛泽民、毛泽覃站在右边,母子亲情跃然纸上。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最喜欢的那张照片。

母亲在长沙治病期间，毛泽东又一次给湘乡唐家托娘舅文正莹、文正兴等写信，通报母亲到长沙后的病症诊治情况，一再表达自己对于舅父舅母给予母亲精心“照拂”的感激之情。他在信中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膺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痞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廛念。肃颂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①

由于医学不发达，毛母在省城医治效果并不见佳，不久便由毛泽民护送回韶山。当年10月5日，不幸病逝于韶山，享年53岁。

其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利用《大公报》等阵地，同反动军阀张敬尧作斗争。接到弟弟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家信，毛泽东立即带上在长沙修业小学读书的小弟泽覃，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可是当他们匆匆赶回家时，母亲已经入殓两天了。显然，作为毛家的长子，毛泽东回来得已经晚了些，但他还是清楚地看到：八舅文正莹帮助极度悲痛的父亲将母亲的丧事办得井井有条。目睹此情此景，毛泽东自然联想到八舅在母亲患病的这几年所耗费的心血，一股无法言表的感恩戴德之情油然而

^①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